

## 郑必坚同志的讲话

刚才费老、雷老同志的讲话很好，我很赞成。

我主要是来祝贺的，祝这次会议能够开得成功。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同志、副院长郁文同志都很重视这次会议，因为实在来不了，所以要我和秘书长刘启林同志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特来祝贺。学会成立十一年，这十一年辛苦不寻常啊！那么今后十年呢，可以预期，应当是更加不寻常。如果我们这次会议，能够回顾十年，有所总结；又展望十年，有所规划，那就一定能够开成一次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带来重要积极影响的成功的会议。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中国社会学能有今日，毫无疑问是同社会学界广大同志们的辛苦努力分不开的。同时，我想我们大家还会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中国社会学能有今日，也是同当年主持社会科学院工作的胡乔木同志和邓力群同志对社会学的支持、重视、推动分不开的，是同中国社会学的前辈及学科带头人——费孝通同志、雷洁琼同志在这十一年中焕发革命青春，作出新努力、新贡献分不开的。当然，我想我们大家还会特别深切地共同感到：中国社会学能有今日，尤其是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同邓小平同志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讲话中关于社会学不应再被忽视而应当“补课”的重要提示分不开的。就以我们社会学这十一年的成果来说，我拜读过一小部分，包括费老的、雷老的，我感到凡属比较重要的成果，都是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强烈的时代气息的。“重访江村”，这就是时代气息呀！几年前我跟费老去欧洲，亲自看到“重访江村”以它所独具的中国乡土的而又新鲜的风采，引起欧洲学者们很大的兴趣。这种时代气息从何而来？来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来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的中华民族伟大变革的新局面，也就是费老讲的“大舞台”。离开这个“大舞台”，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社会学，也就没有今后的中国社会学。

第三点，关于社会学的必要性、重要性，刚才雷老强调指出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胡绳同志、费老同志、雷老同志，以及在座的和今天不在座的其他许多同志，曾经发表过许多精辟的见解。这里我只想简要再说一点，就是关于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必要性、重要性的问题，我认为可以说这是建国以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所取得的若干条重要历史经验教训当中的一条。是否真正承认这个必要性、重要性，是否充分估量到这个必要性、重要性，是否能够把对这个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落实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当中去，这是我们是否正视建国以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历史经验教训的重要问题之一。经验和教训证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必须建立，必须坚持，必须发展，并且必须力争逐步有较大的发展，这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因为它有利于我们在纷繁复杂和不断变化的众多社会矛盾面前保持清醒，有以善处，立于主动地位。因为它有利于我们的社会稳定，在稳定的前提下协调发展。因为它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成熟起来，愈来愈显示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生命力，从而也就能够更加强有力地抵御国际反动势力的“和平演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所以，我们的社会学确实是必要的、重要的，而不是不必要不重要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这样一条历史经验教训，我认为无论如

何不应当忘记。不能因为我们的社会学工作还有这样那样需要努力加以解决的不足，或者某些方面还有这样那样需要认真加以克服的偏颇，就忘记。

第四点，关于面向九十年代。费老刚才讲的“红领巾”精神，雷老讲的进取精神，都使我很感动。这种向前看的精神状态，进取的精神状态，就是要我们面向未来，首先面对九十年代。九十年代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当然可以从多方面来领会。但就社会学来说，我感到有这样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能不能在九十年代这个关键时期，帮助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和政府，在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一整套适合国情的，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体现两大文明建设紧密结合的，体现现阶段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社会政策。这个问题，应当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提出来了。经过十年，有了许多重大的进展，有成功经验，也有若干失误和教训。进入九十年代，我们是否有可能经过努力，加以系统化，形成一整套社会政策呢？我想大家也会注意到，前不久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李鹏总理讲到“八五”计划的时候说，我们不但需要有经济发展计划，而且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改革计划；改革计划里，他又特别提到要形成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住房制度和其它社会和人 际关系的改革。我想大家还会注意到，前不久小平同志讲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时候，讲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要注意收入的调节。我领会，这也就是要求把社会政策问题提到更加突出的议事日程上来。如果再进一步说，九十年代就还有一个关于“小康水平”的研究问题。这里除了生产水平、生活水平，即经济发展水平需要有所衡量之外，我们社会的各方面发展程度，社会的人际关系及各种社会群体的关系，社会在运行机制方面的协调程度、完善程度、成熟程度，是不是也应有所衡量呢？这就也很值得研究了。你看儒家经典，他们所谓“大同”、“小康”，是各有不同水平，并且各有一套表述的，其中就包括不同水平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诸如此类，这就意味着，进入九十年代，我们社会学的研究看来也应当进入一个新的境界。这是从实践需要这一方面来说的。而就学科建设方面来说，伴随着实践的发展，我们对于中国社会及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和发展规律的认识，对各种综合性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的认识，无论在宏观上和微观上，理论上和实践上，也无论分析能力和综合能力，无疑都将大大提高，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我们学科建设的系统化，规范化也一定会大大进步。顺便说一下，我们的学科建设，看来还需要包括把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有分别有步骤地向那些需要这种知识的一部分干部，一部分职工，一部分社会工作者，等等人们，做好适合他们需要的普及工作。恐怕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算是一种科普吧。陆学艺同志告诉我，现在不少地方有社会学学会（但是分布不平衡），有些学会工作很活跃，同社会各界联系很密切，受到人们的欢迎。这也说明，人民需要社会学，社会学的发展对于促进我们社会主义逐步成熟起来确实是很有关系的。

最后，还是回到开头的主题上来，再次祝贺这次会议的召开。同时表个态：我们社会科学院力量有限，水平有限，但是有诚心，愿意跟费老、雷老，跟大家，通力合作。为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应当通力合作。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不要客气。我就讲这些，谢谢！

1990年8月6日